

《清史稿》管同卒年勘误

霍省瑞

管同，字异之，江苏上元（今南京）人。尝师从姚鼐学古文，与上元梅曾亮、桐城方东树、刘开及姚莹，并称“姚门四杰”^①，或姚门“高第弟子”^②。

《清史稿》卷 486《文苑三·管同传》对其生平有简单记载：“同，字异之。少孤，母邹以节孝闻。同善属文，有经世之志，称姚门高足弟子。尝拟《信风俗书》《筹积贮书》^③，为一时传诵。道光五年（1825年），陈用光典试江南，同中式。用光语人曰：‘吾校两江士，独以得一异之自喜耳。’用光亦鼐弟子也。同卒，年四十七，著《因寄轩集》。子嗣复，字小异。能世其业，兼通算术。”^④

笔者在研读管同《因寄轩文集》以及其他姚门弟子的诗文集时，发现此传所记管同卒年与史实相违，兹为订正。

管同生于乾隆庚子，即乾隆四十五年（1780年），现存史料对此多有记载。管同《课诗图记》自言：“图绘于乾隆庚子，同生之年也。”^⑤其《严小秋诗词集序》又载：“嘉庆二十二年（1817年）……是岁也，同盖已三十有八矣。”^⑥嘉庆二十二年推 38 年，亦恰为乾隆四十五年。管同亲自记载，当然毋庸置疑。此外，方东树《管异之墓志铭》又有更为详细的记载：“君以乾隆庚子十月十六日生。”^⑦方东树曾与管同一起师从桐城姚鼐问学，同门所记自然比较详确。况且，方东树当时是“从其孤嗣复求得其遗书，因次其世，以为之志”^⑧。可见该墓志铭内容是可信的。由此可以断定，管同生日为乾隆庚子四十五年十月十六日。

至于管同卒年，《清史稿》本传称“同卒，年四十七”。从乾隆四十五年管同出生推算起，47 岁时，应为道光六年。而事实上，管同于道光七年为代人作《客山堂诗集序》^⑨，道光八年作《宗祠规条序》^⑩，两文均于文末明确记有写作时间，自当无误。之外，姚莹亦于道光己丑九年作《复管异之书》，尚称“异之足下，远承惠问”^⑪。这足以说明至道光九年时，管同不但健在，而且尚与昔日同门旧友飞鸿传书。可见，《清史稿》所记管同卒年有误。然而，管同到底卒于何年？方东树《管异之墓志铭》载：“卒于宿迁旅次，年五十有二。”^⑫自乾隆庚子四十五年推而算之，52 岁时，当为道光十一年，恰与梅曾亮《管异之文集书后》所言“异之卒于道光十一年”^⑬相吻合。梅曾亮与管同同为姚门“高第弟子”。方、梅两位生前同门旧友有相同记载，自然不谬。再考《清史列传·文苑传》卷 73《管同传》亦称“卒，年五十二”^⑭。故此可以断定，管同卒于道光辛卯十一年，年五十二。

那么，《清史稿》本传何以误书“同卒，年四十七”？考察桐城诸家文集，惟见方宗诚《管异之先生传》载“道光十一年管同卒，年四十有七”^⑮。至此，我们似可作出如下推想，方宗诚固知管同卒于道光十一年，却未能进一步考证其具体生年，卒以致误。《清史稿》本传袭方宗诚《管异之先生传》之误，而略去卒年“道光十一年”，直书“同卒，年四十七”，则更谬矣。正确记载当为：“道光十一年，同卒，年五十二。”

注释：

①姚莹《惜抱先生与管异之书跋》指出，“异之与梅伯言、方植之、刘孟涂称‘姚门四杰’”。见姚莹《中复堂全集·东溟文后集》卷 10，安福县署同治丁卯年（1867 年）刊本。郑福照《方仪卫先生年谱》中亦说：“先生（方东树）随侍讲习最久，与上元

- 梅伯言、管异之、同里刘孟涂并为姚先生所最称许，世目为‘姚门四杰’。”见方东树《仪卫轩文集·附录》，同治七年刊本。
- ②曾国藩《欧阳生文集序》称：“姚先生（鼐）晚而主钟山书院讲席，门下著籍者，上元有管同异之、梅曾亮伯言，桐城有方东树植之、姚莹石甫，四人者称为高第弟子。”见《曾国藩诗文集·文集》卷3王澧华校点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，第285页。
- ③管同本有经世之志，然会试不中，抱负难伸。于是将胸怀所蓄，发之为文。面对嘉庆、道光年间清廷统治的内忧外患，管同尝撰《拟言风俗书》、《拟筹积贮书》、《禁用洋货议》等，纵论天下大计。其文指陈时弊，逆料事态，颇具远识，因而传诵一时。管同身为一介书生，其政论文《拟言风俗书》即以“拟臣”口吻，闡论当时“好谏而嗜利”的颓败士风；《拟筹积贮书》亦以“臣闻”开篇，详论粮食储备的重要性以及京都与州县粮仓空虚的原因与对策（两文均见管同《因寄轩文集》卷4，道光十三年管氏刻本）。本传文字原以“拟”字统领二篇，但标点后为“尝拟《言风俗书》《筹积贮书》”，与原文标题稍有出入，易致误解，特此说明。
- ④《清史稿》第44册，中华书局1977年版，第13426页。
- ⑤⑥管同《因寄轩文初集》卷7卷5。
- ⑦⑧⑩方东树《考槃集文录》卷10光绪二十年（1894年）刻本。
- ⑨⑩管同《因寄轩文二集》卷4卷6。
- ⑪姚莹《中复堂全集·东溟文后集》卷6。
- ⑫梅曾亮《柏枧山房诗文集·文集》卷5彭国忠、胡晓明校点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，第109页。
- ⑬王钟翰点校《清史列传》第19册，中华书局1987年版，第6028页。
- ⑭方宗诚《柏堂遗书·柏堂集续编》卷12，光绪七年刻本。

（作者霍省瑞 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邮编 610065）

（责任编辑 韩永福）

（上接第110页）

- ⑫⑬⑭⑮《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：湖北开采煤铁总局 荆门矿务局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，第163—165、163、168—169、168—169页。
- ⑯⑰⑱⑲⑳《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：中国通商银行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，第60—61、54、52、115、115页。
- ㉑吴剑杰《论张之洞湖广任内的外才引进》，陈锋等主编《张之洞与武汉早期现代化》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，第102页。
- ㉒郑剑顺《晚清史研究》岳麓书社2003年版，第235页。
- ㉓周育民《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，第468页。
- ㉔⑴⑵⑶⑷⑸⑹⑺⑻⑼⑽⑾⑿《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：汉冶萍公司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，第474、925、269、10、19、153、245、106页。
- ⑿⑳《洋务运动》（一），第573、349、574页。
- ㉑王之春《清朝柔远记》中华书局1989年版，第314页。
- ㉒《洋务运动》（二），第414页。
- ㉓夏东元编《郑观应集》（上），第90页。
- ㉔向中银《晚清外聘人才的奖赏制度》，《近代史研究》1996年第5期。
- ㉕《欲兴矿务宜选子弟赴欧西矿务学堂肄习论》，何良栋《皇朝经世文四编》卷44，台湾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。
- ㉖郑剑顺《福建船政局史事纪要编年》，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，第21页。
- ㉗李鸿章《筹议天津机器局片》《李文忠公全集·奏稿》卷17第16页。
- ㉘《袁世凯奏议》（上），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，第484页。
- ㉙夏东元《郑观应传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，第158页。
- ㉚《戊戌变法》第2册，上海人民出版社版1961年版，第282页。
- ㉛《中国海关秘档》（一），中华书局1990年版，第178、455页。

（作者赵入坤 中国矿业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 邮编 221008）

（责任编辑 哈恩忠）